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陶器卷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陶 器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陶器卷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325-7268-7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文物—研究—中国②陶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0.4②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454 号

责任编辑 钟小燕

装帧设计 何 昶

本书版权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有。未经允许,不准以任何形式、任何文字在世界任何地区翻印、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违者必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陶器卷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印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268-7/K · 1862

定 价 46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凡 例

1. 本卷遴选陶器的原则是兼顾文物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尽可能选取各考古学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陶器。有些早期文物虽不十分美观，有的还是残片，但因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被收入。本卷收入馆藏陶器258件（套），力求勾勒出我国大陆古代先民制作与使用陶器的脉络，展现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各时段陶器生产与发展的面貌和水平。
2. 本卷编辑体例按陶器所属的年代顺序及分布地域排列，大致分史前时期、夏商时期、周秦汉唐时期几个阶段。史前时期按照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排列顺序，即依照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早晚以及分布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北方地区等地域顺序进行编排，体现了考古学文化中陶器的编年序列和区系类型的发展与传承关系。历史时期亦按年代顺序排列。
3. 为了增加本卷的学术性，在文物说明中对每一件陶器的名称、原器物号、尺寸、出土地点、时代和文化类型等信息进行了描述，同时还叙述了出土器物的遗址概况以及器物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及特征，并对文物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作了简要评价。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编纂委员会

主任 吕章申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古建东 白云涛 冯靖英 吕章申 关双喜 孙彦贞

李六三 佟伟华 张 威 陈成军 陈履生 金 祥

相瑞花 信立祥 耿东升 铁付德 高世瑜 黄振春

黄燕生 盛为人 董 琦 谢小铨

学术顾问 潘震宙 王宏钧 史树青 孙 机 朱凤瀚 王冠英

主 编

吕章申

执行主编

陈履生

统 筹 铁付德 谢小铨

编 务 盛为人 李守义

陶器卷

分卷主编 佟伟华

撰 稿 佟伟华 张素琳 于 璐

摄 影 董 清

总序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吕章申

加强馆藏文物研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实施“学术立馆”方针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与“藏品立馆”相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自1912年建馆之初就十分重视对馆藏文物的整理与研究，1926年编辑出版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就刊登了馆藏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如《馆藏周代彝器记》《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太平天国玉玺考略》《馆藏贞石录》《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馆藏古玉记》等，从中可以看出其注重馆藏文物研究的学术氛围和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这一传统，在国家博物馆不同的历史阶段一直在延续、发展和提升，百余年来取得了丰富的藏品研究成果，培育出了众多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和学者。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对馆藏文物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大缺憾。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史学理论的新发展，有必要对全馆馆藏文物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2003年2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组建后，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基础上启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项目，目的是整合国家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力量，发挥国家博物馆在文物研究方面的特殊优势，促进本馆的“软实力”建设，全面提升全馆的业务和学术水平，以彰显“学术立馆”的深厚根基。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120万件各种类别的丰富的文物藏品，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源泉。而国家博物馆人才云集，有副研究馆员以上的高级职称专业人员200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专家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各研究领域占有领先优势。2007年3月，国家博物馆因改扩建工程而闭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出版9卷后也因文物“搬家”而暂停。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顺利完成并重新开馆，馆舍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成为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在新的宏伟殿堂里如何体现“无处不历史，无处不艺术，无处不学术”的国博理念，如何落实“人才立馆、藏品立馆、学术立馆、服务立馆”的办馆方针，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

新国博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文物搬迁工程结束后，国家博物馆重新启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剩余30余本的出版工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是一套馆藏重要文物著录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著作。它的陆续出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落实“学术立馆”方针所取得的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科研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对本馆的文物征集、展览陈列、文物保护、文物研究等工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也会在国内外史学、考古、文物、博物馆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更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2014年9月

前 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陈履生

远古神话中的女娲“抟土造人”，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始祖开世造物的故事，而且以黄土和水这两种极为普通的物质构成人类生态系统的基础，而通过原始陶器的印证，将物质基础中的最为普通的内容扩展成为原始艺术中最重要的审美对象。陶器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的文明时期，新的物质材料的使用将人们的思想通过可以塑造的方式固定下来，从而突破了此前因为工具的限制而很难对石头表现出随意的思想和作为。当然，利用黄土和水的随意可塑性以及火的运用，世界的许多角落进入陶器时代后所创造的各种器物，不仅在大小及形制上表现出审美上的判断，而且在与实用相关的细节上表现出了超越地域的共同性特点。更重要的是，在造型基础上的各类图案，既有适合性的巧思，又有地域和文化上的特色，由此也突出了审美的意义。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陶器所展现的中华民族文化最初的美学，通过各种文化类型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的魅力。

以圆形为主体的罐、壶、盆、瓶、豆等以及异形的盃、鼎、尊等可以盛物的陶器，是中国陶器的主要品类，它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器用特点，而文化类型给与造型上的差异，使得中国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绽放出灿烂的文明。舞蹈纹彩陶盆上的翩翩起舞，见证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生活。而裸体双性浮雕彩陶壶中的裸体双性浮雕更是人类自身的写照，亦或是人类对于生殖崇拜的符号。还有那些鱼纹、蛙纹、涡纹、人面鱼纹以及几何纹等等，其装饰性的特质都为陶器增加了丰富的审美内容。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其他象形器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先人对现实的模仿，还表现了与某种形象相关的信仰和崇拜等具体的内容。陶鹰鼎、船形彩陶壶等所具有的特别的形制，标志着那个时代基于陶的运用所达到的较高的造型水平。还有像陶纺轮、陶印模（范）等与实用相关的工具，一方面见证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还说明了一些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

陶文化经历了由素到彩的发展过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将陶文化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此后，釉的发明给原始陶器带来了光润的表面，也带来了

审美上的提升。可是，这一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发展，并没有完全中断陶器的发展历程，在结束了以实用器为主的陶器文明之后，随葬的明器大量使用陶制品，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辉煌和荣耀，也寄托了后人的希冀和期盼。从秦始皇兵马俑到汉代兵马俑以及其他大量的明器，为中国雕塑艺术谱写了一页特殊的篇章。秦兵马俑的规模与阵势，表现了统一国家的盛世，而汉代击鼓说唱俑的形神兼备，一直成为陶塑艺术的代表，诠释了汉代艺术的特质。而唐代陶俑中的天生丽质与乐舞，也在承传汉代陶俑艺术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汉唐陶俑以及像陶楼、陶谷仓、陶马、陶家畜等其他明器的丰富性，将陶器文化的发展又推向了一个与马家窑文化并峙的历史高峰。

毫无疑问，与时代相关的陶器艺术在瓷器的发展和强盛的过程中逐渐衰落，成为历史的必然。宋以后陶器的存在以民间的方式，以粗糙、简朴的风格，为地下的坟茔内的上层与地上现实社会中的下层所使用，因此，在脱离了主流社会的需求之后，陶器渐为人们所忽视。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各个时期的精美陶器，其中不乏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陶器卷》的258件（套）陶器，多为考古发掘品，少量是经考古调查采集而来，还有部分是本馆征集所得。本书依照历史年代分为史前时期、夏商时期、周秦汉唐时期几个阶段，其中属于史前时期的约占总量的59%，夏商时期的约占21%，周秦汉唐时期的约占20%。遴选文物的原则是兼顾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等多方面，尽可能选取考古学中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典型器物。编者力求通过本书勾勒出中国古代先民制作与使用陶器的发展脉络，展现我国大部分地区陶器生产与发展的历史。因此，有些早期文物虽然器形并不十分美观，甚至有些还是残片，但因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被收入本卷。在学术价值为重的前提下，作者也尽可能兼顾艺术价值，选取完整、优美的器物，以从一个侧面表现中国古代陶器的艺术风貌。

本书按陶器的时代先后及分布地域排列。史前时期以陶器的区系类型为基本框架，按照考古学中文化的分区分期为序，依照文化的年代早晚以及分布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北方地区等地域为顺序进行编排，体现了考古学文化中陶器的编年序列和区系类型的发展与传承关系。历史时期亦按时代顺序排列。为了尽可能为学界提供更多的信息，并保证其学术性和严谨性，作者在文物说明中除了对每一件器物的名称、馆藏编号、原器物

号、尺寸、出土地点、时代和文化类型等信息进行了介绍和描述以外，还叙述了出土器物的遗址概况以及器物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及特征，并对文物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作了简要评说。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是在对馆藏文物进行全面清点、分类整理并系统研究之后编辑出版的一套系列丛书，它凝聚了几代国博学人和专家的辛劳与智慧，是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为了把这些承载着超越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藏品和学术成果公之于众，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从12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1万余件，这些文物基本涵盖了各个时期、各种品类，按照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金银器、甲骨、碑帖、绘画、书法、墓志、砖瓦陶文、陶俑、铜镜、玺印、钱币、古籍善本、明清档案、杂项和历史图片等分为19卷，40余册。每卷图文并茂，形象地揭示了各类文物的形貌特征以及文化内涵。

本丛书的各卷内容基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图版和图释文字。图版作为主体，包括器物的整体图片及必要的细部、纹饰、铭文、款识、题跋和拓片、线图，图释文字包括品名、时代、出土时间和地点、流传、著录等基本情况，还有对形制特征、艺术特点以及研究情况等简要的描述和说明，有些并附有释文和简洁的考释文字。二是研究论文，系对该卷（册）馆藏文物涉及到的有关学术问题所作的专题研究，或以所录文物为线索，对该类文物进行综合性、通论性的论述。因此，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全书展现了文物分类、断代、定名等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每件文物图释文字的撰写，都试图从多维的角度还原历史的面貌，从文化的立场阐述与之相关连的问题。我们希望以丰富详实的学术成果，区别于以往出版的文物图录。从资料性方面而言，所有图版均与文物比对核实，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文物的真实状况，器物有多角度的图片，绘画则附有局部图像，使公众和学界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这些具有丰富历史和艺术信息的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该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丛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室同志的多方配合，并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使得这部丛书的前期准备和编撰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2015年1月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陶器拾珍

佟伟华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定居生活的产品，它的起源和发展与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相伴相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因此陶器的产生和发展与农业民族的兴衰史具有密切的联系，成为古代农业民族日常生活中最为大量使用的生活器皿，进入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陶器在人类历史上被广泛使用，其最大的原因是制作相对容易，付出劳动力低，因此，当青铜器、铁器等金属器以及瓷器等大量出现后，仍未能完全取代陶器，直至汉唐时期乃至其后，人们仍在制作与使用陶器。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凭借聪明才智制作了大量各式各样的陶器，它们也是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保留下来的数量最多而又极为重要的遗物。陶器最能反映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以及不同时空范围内人们不同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和地域风情，是对先秦各时期的古代物质遗存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千姿百态的陶器，以其种类繁多而优美的式样、凝重缤纷的色彩、繁复瑰丽的图案，无声地叙述着中华民族的灿烂历程，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生存在不同地域的古代先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多彩的生活画卷。

一、馆藏陶器的来源

我馆对陶器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初叶的建馆初期，当时主要是通过征集和收购的途径，收集到一些民间流散的陶器。而较为大量的陶器收藏，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二十世纪

五十至六十年代我馆先后从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甘肃、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北、四川、吉林等地接收了成批陶器，其中以中原地区河南、陕西、山东等省的文物最多，如河南陕县庙底沟、三里桥、洛阳王湾、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山东泰安大汶口、日照两城镇等遗址，其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直至夏商周及汉代。另外一批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来的发掘及征集于甘肃的陶器，大部分为彩陶器，是极具学术与艺术价值的精品。自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我国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我馆在通史陈列的修改中，得到了中央及全国许多省区文博单位的支持，又陆续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上海、浙江、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内蒙、辽宁、吉林、宁夏、青海、西藏等地接收了部分陶器，其中，以山东胶县三里河、邹县野店的陶器数量为多。这些文物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其范围广及长江流域、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极大地拓展了收藏陶器的地域范围。这些陶器多是中央及各省区文博单位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不少已在考古报告中正式发表，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地点、遗迹单位、层位关系以及器物的共存关系，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少部分陶器是通过考古调查采集或民间征集而来。

二、史前时期的陶器

本卷收入的史前时期陶器共百余件，约占全书的一半。这些陶器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出土地点广布全国，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看，已能粗略勾划出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时空框架。

新石器时代早期约为公元前12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我国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存极为稀少，迄今所知，北方地区有山西北部怀仁鹅毛口、陕西大荔沙苑、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等地点以及发现于中原腹地的李家沟文化。在华南地区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县玉蟾岩等洞穴遗址，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本卷收入了万年仙人洞和桂林甑皮岩两个地点的陶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为夹有石灰岩砂粒的粗红陶，火候明显偏低，器壁薄厚不均，器形简单，主要有罐、釜、钵几种，器表花纹以绳纹为主，少量为条纹、划纹、席纹，陶器制作用泥片贴塑和泥条垒筑等方法，代表着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工艺初始阶段的生产水平。仙人洞出土的绳纹陶缸和甑皮岩出土的陶片都是极为珍贵的早期陶制品，万年以来，人类从此开始了漫漫的制陶历程，没有这一时期的人类成功地利用热能，使可塑性极强的陶土改变化学性质，从而产生人工创造的陶器，就没有其后的数千年来各种陶制品的出现。就两个地点的比较而言，甑皮岩的陶器出现了泥质陶，器表纹饰相对丰富，其年代可能晚于仙人洞。

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遗存在我国发现也不多，中原地区有河北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半岛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关中的白家文化，长江流域有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彭头山文化以及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这一时期的陶器全部处于手制阶段，多为泥条盘筑。本卷收入了磁山、裴李岗、北辛、河姆渡、彭头山、新乐等五个地点的陶器，展示了这一时期陶器的特征与制作工艺。

磁山文化（公元前6100—前5600年）与裴李岗文化（公元前7000—前5000年）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发现之初曾被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应属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两支文化分别分布在冀南与豫中，具有十分相似的时代特征，如都出土有加工粮食作物的石磨盘、石磨棒，陶器中都有三足钵、小口双耳壶、筒形罐等。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磁山文化以靴形支架、大平底陶孟为主要炊器，裴李岗文化却没有，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些陶器烧制火候都较低，器形不规整，至今尚未发现彩陶。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200—前4200年）更是独具特色。河姆渡遗址的最下面两层属于河姆渡文化，其陶器均为手制，胎较厚，多夹炭黑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器表多拍印绳纹，陶器造型多见圜底和平底器，主要器形有大量的釜、罐以及钵、盘、器座、支脚等。这些陶器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最早的陶器遗存，与中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虽然时代大抵相同，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却判然有别，足见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生产的陶器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至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数量剧增，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区。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是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主要是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上游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及齐家文化，长江中游主要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主要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华南地区主要是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北方地区主要是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及小珠山中层文化等。

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器全部为手制。收入本卷的仰韶文化早期陶器以宝鸡北首岭和西安半坡两个地点最为集中，属于半坡类型早期，陶器多圜底器、尖底器和平底器。主要器形有杯形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戳印纹小口大腹壶、圜底钵、彩陶盆、弦纹罐、蒜头壶、盃、鼎等。此期彩陶占有一定比例，这里收入的彩

陶器有船形双耳彩陶壶、墨彩带钵，黑绘符号小平底罐、交叉三角形彩陶壶、波折纹红彩陶壶，鱼纹盆、人面鱼纹盆等。这些彩陶多施黑彩，红彩很少，宽带纹、平行条纹、三角纹、网纹等几何纹饰和人面纹、鱼纹等母题组成的各种图案，以直线条为多，很少使用曲线，其中人面鱼纹是半坡类型最富代表性的纹饰。半坡类型彩陶是仰韶文化早期彩陶艺术的杰作。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这一类型的陶器如环形口尖底瓶或平底瓶、弦纹附加堆纹罐、分体釜灶、曲腹盆、曲腹钵、釜形鼎等颇具特征，这一时期的彩陶比例进一步增加，流行圆点、弧线三角、勾叶、涡纹组成的花瓣纹，多施黑彩。本书收入了弧线三角勾叶纹彩陶盆、彩陶钵、彩陶罐、蛙纹彩陶盆、曲腹盆等，洋溢着这一彩陶文化瑰丽、流畅、多姿多彩的艺术气息。还有出土于陕西泉护村的鹰鼎亦为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河南临汝闫村出土的一件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先民从事农业与渔猎的生活画面，这件来自数千年前的艺术品架起了沟通古今的桥梁，带我们走进了5000多年前的仰韶时代，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们手持利斧开拓荒野，鹳鸟在河岸徘徊，鱼儿在水中欢快地跳跃。聆听着那时鸟儿的鸣叫，感受着那时农业与渔猎生活的艰辛和恬静，浓浓的远古生产与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之后进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前2500年）。这一文化上承仰韶文化，下启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在晋南、豫西及关中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这一时期的遗存。根据丰富的陶器资料，这一文化被分为早、中、晚三期，表明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这一时期的陶器以手制为主，口沿多用慢轮修整，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多饰绳纹、篮纹及附加堆纹，主要器形有附加堆纹深腹罐、小口平底瓶、盆形鼎、罐形鼎、斝、釜灶、盆、甑等。本书收入了陕县庙底沟、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盆形鼎、细篮纹圆腹斝、连体釜灶等陶器，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最为典型的器物，此时彩陶已基本消失。这以后与之相

衔接的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都相继进入了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代（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轮制陶已极为普遍，纹饰以绳纹、方格纹为主，主要器形有鬲、鬶、斝、罐、盆、碗、杯、甑、豆、器座等，其中单把鬲、双耳斝、单耳杯、双腹盆、高领罐、圈足盘、圈足豆等极富特征。收入本书的洛阳王湾、陕县三里桥、长安客省庄等地点的单把鬲、甗、黑陶折腹斝、双腹盆、镂空器座、附加堆纹双平斝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伴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的陶器革命，一改仰韶文化陶器的面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制陶技术走进了轮制时代，新的技术使陶器的种类增多，器形素雅规整，工艺精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黄河下游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史前文化由后李文化及北辛文化发展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500年）的分布遍及山东全省及苏皖北部，通过对大量陶器的类型学研究，排列出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可将大汶口文化分为八期，也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这使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出来。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与中原地区多有不同，展现的是我国东方夷人的制陶风貌，无论是器物种类还是陶器形制以及装饰风格，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大汶口早期的陶器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均为手制，器表多饰刻划纹、锥刺纹和镂孔，彩陶很少，有黑、红、赭、白几色，多见宽带状几何形纹饰，有曲尺纹、八角星纹、回纹、花瓣纹等。中期的陶器灰陶明显增加，出现了少量黑陶，手制中开始了慢轮修整，镂孔、编织纹、弦纹等纹饰流行，彩陶出现了复彩。晚期陶器以黑陶和灰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白陶，以轮制为主，纹饰主要有弦纹、镂孔、篮纹，彩陶已逐渐衰落。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主要器形有釜形、盆形、罐形鼎、三足鬶、豆、高柄杯、觚形杯、背壶、鬻等。本书收入的邹县野店、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曲阜西夏侯、安丘景芝等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陶器都十分精美，计有三足红陶鼎、高柄杯、彩陶

背壶、白陶鬶、镂孔豆、彩陶盆、白陶杯、陶尊等，均是大汶口文化最富代表性的器物。陵阳河出土陶尊上刻划的日月山图像，被认为是大汶口族群的族徽，更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海岱地区继承大汶口文化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在龙山时代的诸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具有最典型的龙山时代特征。这一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相似，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这一文化的多处遗址中发现了铜器、铜块或铜炼渣，表明这一文化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它的陶器以轮制为主，器形极为整齐，薄厚均匀，造型美观，以黑陶及灰陶占绝大多数，器表多素面，磨制光亮，常见纹饰有弦纹和镂孔，三足器和圈足器发达，陶器种类多样，流行附加嘴、流、耳、鼻、把等，口部多为子母口，主要器形有盆形或罐形鼎、袋足鬶、甗、豆、蛋壳陶杯、高柄杯、壶等。本书收入的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泗水尹家城的陶器有带盖鼎、带盖壶、带盖罐、双耳杯、单耳杯、高柄杯、蛋壳陶杯、镂孔豆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鬶等，极具龙山时代风格，其中的一件蛋壳陶杯虽有破损，但其器表细润光亮，胎薄如蛋壳，镂孔装饰精致，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艺术品。

生活在黄河上游黄土高原的先民以创造独具特征的彩陶文化著称，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总称马家窑文化，由当地的武山石岭下类型发展而来。马家窑文化的分布，东起甘肃清水和宁夏西南，西至青海贵德，渭水上游、湟水与洮河中下游是其中心分布区。马家窑期（公元前3200—前2600年）的陶器以橙黄色为主，纹饰主要是绳纹和附加堆纹，彩陶较为发达，母题主要是黑彩弧线、弧边三角和圆点纹组成的图案，鸟纹、蛙纹多用写实的手法。主要器形有彩陶罐、细颈瓶、盆、钵、碗等。本书收入的马家窑陶器有涡纹彩陶罐、彩陶钵和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彩陶线条疏密均匀，笔调流畅，富于动感，舞蹈纹再现了原始先民举行祭祀或庆祝活动欢快的场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马家窑文化中的半山期（公元前2600—前2300年）及马厂期（公元前

2300—前2000年）彩陶在全部陶器中所占比例高达80%以上，半山类型常见的花纹是黑红两彩相间的锯齿纹、漩涡纹和圆圈纹，主要器类有小口细颈壶、细颈瓶、双耳或单耳彩陶罐、长颈壶等。马厂类型彩陶以红陶最多，流行施红色陶衣，饰黑彩或红黑复彩，最多见的是一周等距分布的四大圆圈纹，其他还有菱形格纹、折线纹、网纹等。此时的彩陶线条远不如马家窑期细腻，时间越晚线条越显得粗放潦草，绘制彩陶已不仅仅是少数画工所为，未经专门训练的人也敢拿起画笔，使早期精美的风格丧失，这也是彩陶在此时批量生产的反映。本卷收入的马厂及半山彩陶以各种形式的双耳彩陶罐为多，还有单耳壶、彩陶豆、双格盆、彩陶鼓以及浮雕裸体人像彩陶壶等。其中的浮雕裸体人像彩陶壶是马厂期彩陶中不可多得的珍品，雕塑技法写实而简练，塑造出两性人体的结合，表现了对生殖的崇拜。马家窑文化各期的陶器全部为手制。

马家窑文化的延续是齐家文化（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时期因有较多的铜器出土，证明甘青地区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较中原的龙山文化年代略晚。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的下限已进入夏纪年范畴。齐家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多，少量为细泥陶，以红褐色和橙黄色为主，多为手制，纹饰中多为篮纹和绳纹，其他还有刻划纹、锥刺纹、附加堆纹等。彩陶在此时已经衰落，数量较少，多为红、黑色单彩，常见的花纹是菱形格和三角形几何图案，线条亦潦草粗糙。主要器类是双大耳罐、高领罐、侈口夹砂罐、豆、碗、鬲等，本书收入的双大耳彩陶罐、双大耳大口罐、单耳罐、小口罐、大耳罐等，代表着这一文化的特征。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中游与下游两个地区。中游地区年代较早的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公元前4200—前3000年）的分布广及川东、湖北、湖南等地，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区。它的陶器多为手制，以夹炭红陶占绝大多数，器表多施红衣，彩陶极为发达，花纹多见绞索纹与横人字纹，主要器形有圈足盘、碗、豆、曲腹杯、束腰筒形瓶等，圈

足器及三足器较为发达。本书收入的大溪文化陶器有四川巫山火爆溪、湖北宜昌杨家湾、松滋桂花树的觚形彩陶瓶、陶支座、深腹红陶罐和湖南安乡汤家岗的白陶盘等。其中的彩陶瓶是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川东调查时采集到的，这一发现引导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川东、鄂西地区大溪文化的探索，因此这件彩陶不仅是大溪文化的典型器，更成为大溪文化发现与研究的重要线索。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与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域大体一致，晚于大溪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是这一文化最典型的遗址。这一文化的陶器仍以手制为主，多为泥质灰陶，少量为红陶，纹饰中以弦纹和镂孔为多，彩陶数量也较多，多施红、白色陶衣，再绘黑色或赭色圆点、网格、弧线三角和宽带纹。这一文化还盛行彩陶纺轮，陶器造型流行圈足器和三足器，主要器形有鼎、圈足盘、豆、碗、杯、壶形器、高领罐等。本书收入的网纹彩陶壶、高领灰陶壶、孟形器、镂孔豆、黑陶鼎和附加堆纹筒形器等，出土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两个遗址，都具有鲜明的屈家岭文化特征。筒形红陶器由多件套合形成管道状遗迹，用途不明。分布于长江中游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500—前2200年），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在其四周还有与之同时的其他类型文化存在，同属石家河文化。石家河遗址群是江汉平原上规模巨大的聚落群，由石家河城址及其周围密布的数十个遗址组成，是这一文化的集中代表。这一文化的陶器以轮制为主，少量为手制，陶色以灰陶和灰褐陶为主，少量为红陶和黑皮陶。主要纹饰是篮纹，次为方格纹、镂孔、弦纹、附加堆纹等，圈足器和三足器仍很发达，主要器类有高领罐、罐形鼎、盆形鼎、豆、鬻、钵、红陶杯、圈足杯、尊等。本书收入了石家河文化邓家湾遗址出土的动物陶塑。这些陶塑包括猪、狗、羊、鸟、鸡、鸭等，在遗址中数以千计，在石家河文化的其他遗址中十分罕见。

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应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系统，分布于太湖周围。崧泽文化（公元前3900—前3300年）

在年代上处于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墓葬，随葬陶器仍为手制，开始了慢轮修整，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少量为黑皮陶，主要纹饰有弦纹、镂孔、刻划纹及附加堆纹，彩陶很少，造型流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主要器形有盆形、釜形、壶形鼎、圈足盘、圈足豆、圈足罐、折肩壶、折腹壶、平底杯等。本卷收入了崧泽遗址出土的盆形扁足鼎、镂孔划纹豆、小口高领壶等，是崧泽文化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崧泽文化之后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400年）在长江下游更有着广泛的分布，其发现可追溯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多年来在苏南、浙北以及上海周围发现及发掘了大量良渚文化遗址，特别是在杭州余杭附近发掘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随葬玉器的大型墓葬、祭坛以及良渚古城和莫角山高等级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玉器、纺织品、竹木器等礼器和生产生活用具，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崇拜意识，显示出社会的剧烈分化，表明这一文化已处于文明社会的门槛上。陶器中多见夹砂黑褐陶和泥质黑皮陶，有相当一部分陶器为轮制，素面为主，纹饰中多见弦纹、镂孔、竹节纹、线刻纹，彩陶很少，三足器和圈足器极为发达，多附加贯耳、宽把、盲鼻等。体现该文化特征的器形有鱼鳍足鼎、袋足鬻、圈足豆、双鼻壶、圈足壶、带流杯等。本卷收入了浙江钱山漾、浙江余杭镇南湖、余杭良渚、上海松江广富林、上海马桥等遗址出土的扁足鼎、豆、黑陶双鼻壶、黑陶簋、细刻纹黑衣陶罐、带盖黑陶壶等，其中的黑陶豆、簋、壶磨制光亮，器形规整，是良渚文化陶器的杰作。

在我国华南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也分布着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本书收入了广东马坝石峡出土的三足盘、三足鼎，福建闽侯昙石山出土的灰陶釜、豆，都是极为珍贵的陶制品。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昌都卡诺遗址是我国西藏地区最早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这里出土的附加堆纹碗和红陶罐，代表着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的原始文化面貌。本卷还收入了我国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的陶器。红山文化（公元前4500—前3000

年)是分布在内蒙、辽西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中上游的考古学文化，它的陶器有夹砂灰褐陶和泥质红陶，多为手制，器物种类单调，大多数为筒形罐，其他还有盆、钵、瓮等，多见平底器。器表纹饰以之字形压印纹、附加堆纹、刻划纹、锥刺点纹、斜线纹为多。有少量彩陶，多见黑彩或红彩直线、斜线、弧线三角等母题构成的图案。本卷收入了敖汉旗小河沿的一件彩陶碗和喀左东山嘴的一件红陶孕妇塑像，陶塑孕妇出土于东山嘴石砌圆形祭台周围，是红山文化不可多见的陶制品，祭台基址很可能具有宗教意义，反映了红山文化族群对女性生育的崇拜。

三、夏商周三代的陶器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夏代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承袭河南龙山文化的是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800—前1600年)，故二里头文化在年代上与夏纪年大抵相当，是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根据二里头遗址多年来的大量发掘资料，已有不少学者认同二里头遗址即为夏代的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以豫西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地区。近几十年来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城垣、宫殿、夯土台基、祭祀基址、房址、灰坑、成批墓葬以及制陶、制铜等遗迹，出土了极为可观的青铜器、漆器、玉器、竹木器及大量陶器。近十年来，二里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通过连续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发现了长期没有寻觅到的宫殿区城垣、大型建筑基址群以及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和道路网，搞清了这些遗迹分布的基本格局，使这一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得到确认，二里头即为我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根据对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可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大量遗迹分属不同的期别，据此，基本廓清了二里头聚落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此外，还在晋南的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其陶器也可分为四期，各期的年代比二里头略晚。这一文化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在晋南地区还有

其他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被发现和发掘。二里头文化的陶器极为丰富，有轮制及手制两种，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主要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等，主要器类有鼎、鬲、深腹罐、圆腹罐、小口高领罐、大口缸、深腹盆、三足盘、平底盘、豆、澄滤器、小口尊、甑、盉、觚、爵等。本书收入了偃师二里头、洛阳东干沟、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南关、郑州洛达庙、河南巩义等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陶器，主要有附加堆纹罐、双鳌圆腹罐、深腹罐、平底盆、瓦足皿、豆、爵、盉等，展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风貌。

商灭夏后，商王朝在中原迅速崛起，商代前期的郑州二里岗文化是商人的物质文化，可分为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上层两个时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这一时期商人在中原及南方兴建了多个城址，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盘龙城、垣曲商城等。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很可能为都城遗址。两期陶器的制作以轮制为主，部分为手制。陶质均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弦纹、附加堆纹为多。二里岗下层的鬲为薄胎卷沿细绳纹，盆、甗、罐器口多为卷沿圆唇，大口尊体略宽，口径与肩径略等或稍小。二里岗上层的鬲多为厚胎折沿粗绳纹，盆、甗、罐等口沿多为折沿方唇，大口尊体瘦长，口径明显大于肩径。此期新出现了假腹豆等器形，还出现了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本书收入了郑州二里岗、铭功路、南关外、垣曲商城等地点出土的卷沿细绳纹鬲、方唇折沿粗绳纹鬲、大口尊、饕餮纹罍、云雷纹瓮、灰陶盆、簋、厚胎缸、仿铜陶爵、陶印模等，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商代是青铜器的初期发展阶段，一些陶器开始装饰仿铜器花纹，如饕餮纹、云雷纹等，本书所收的饕餮纹罍磨制光亮，纹饰流畅清晰，是商代陶器的精品。还有一些陶器是仿照青铜礼器和酒器的造型制作的，如陶爵等。位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是商代晚期盘庚迁殷后的都邑，此后273年不再徙都。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宫殿宗庙区、王陵区、祭祀区、墓葬区、手工业区内的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王陵大墓、人祭坑、制石、制玉、

制骨、制陶作坊以及铸铜遗址等，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陶器以及大批甲骨卜辞，展现了商代晚期社会发展的高度水平。这一时期的陶器制作更加规范，装饰风格更趋向于铜器化，出现了更多的仿铜器作品，刻划纹白陶的出现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新水平。陶器也出现了大量新器形，主要器类有鼎、簋、豆、爵、尊、觯、罍、卣等，大部分为礼器，花纹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本书收入的陶器爵、带盖盨、甗、簋、坩埚等，除了坩埚以外，都是仿铜陶礼器，比二里岗期的陶器有了明显的进步。

夏商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也进入了铜器时代，分布于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及沙井文化。辛店文化(公元前1600—前600年)分布于甘青两省交界的黄河两岸以及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陶器仍多为手制，种类有双耳罐、四耳罐、鬲、盆、杯、鼎、豆、盘等，彩陶发达。辛店文化可分为张家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本书收入的张家嘴类型陶器出土于甘肃东乡唐汪，另有许多是从甘肃各地征集而来，有四耳罐、单耳罐、双耳彩陶罐、单耳彩陶罐、彩陶豆等，陶器多为泥质红陶，彩陶多为黑彩，纹饰以弧线纹、三角纹、勾连纹为基本母题。本书收入的姬家川类型陶器出自甘肃临洮辛店、灰嘴、郭家坪、永靖魏家川、黄村等地点，还有一些是从甘肃征集而来。仍以罐、壶类为主，有双耳彩陶罐、双耳彩陶壶、双大耳罐、花边口双耳罐、绳纹鬲等，双耳罐多为中等大小，少量为大口矮宽，制作规整。陶器仍多为红陶，施紫、黑色复彩，彩陶花纹多为斜线三角纹、双勾纹、同心圆纹、横竖直线纹、波折纹、变形S纹等，图案疏密得当，素雅而华丽。此外，本卷还收入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出土的青铜时代陶器，有印纹硬陶豆、尊、杯、钵形豆、弦纹壶、带流罐、小平底壶等。

两周时期由于青铜器的高度发展，陶器制作已明显衰落，造型与装饰等方面已不为人们所重视，多只为满足实用的需要，批量生产而造成器形种类单调，多为轮制。西周时期(公

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灰陶，少部分为磨光红陶和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鬲、罐颈部的绳纹常被抹去，其他纹饰还有云雷纹、S纹、重圈纹，以鬲、罐、簋、豆、盆为基本器形。早期以瘪裆鬲为特征，晚期的鬲多为柱足，豆柄变细。本书收入的陕西西安客省庄的鬲、簋、罐、壶正是西周时期的典型器物。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陶器陶质粗糙，仍以夹砂灰陶为主，以绳纹为大宗，与西周时期相比，基本器形仍为鬲、鼎、豆、罐、盆等，但形制发生了变化，鬲变为乳突状矮足，豆盘变浅，新出现了盖豆及带盖鼎。本卷收入的春秋时期的陶器有侯马晋国遗址铸铜陶范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罐、双耳小罐等。

四、战国汉唐的陶器

战国以后，我国进入了铁器时代，但日常生活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多数为轮制，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陶器的基本器形主要有鼎、豆、壶、敦、盒等，纹饰中多为暗纹、绳纹，有少量彩绘、篮纹、方格纹、刻划狩猎纹、鸟兽纹。本书收入的北京昌平、河南辉县固围、登封告成、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方壶、陶量、陶鉴、鸟料等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两汉时期(公元前206—220年)的陶器分为灰陶、硬陶和釉陶三种，以灰陶为主，火候较高，均为轮制，多为素面，有少量彩绘陶。日常生活用具有罐、盆、瓮、樽、盘、碗等，仿铜陶器有鼎、钟，西汉时期盛行的陶钫至东汉时期消失。汉代出现了为随葬制作的陶质明器，西汉前期有仓、灶，中期出现了井、磨、碓房、农田、陂塘、楼阁、猪圈等模型，以及狗、牛、猪、鸡、鸭等动物塑像，直到东汉时都极为流行，另还有大量的陶俑用于随葬。硬陶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釉陶在汉代极为普遍，器表呈浓重的棕黄色或绿色，多饰于鼎、钟、仓、灶、井、楼阁等器物上。本书收入的汉代陶器有西汉时期的彩绘陶壶、彩绘带盖鼎、釉陶壶、釉陶奁、釉陶灯、陶囤、陶仓、陶壶、陶量、四联陶罐等；东汉时期的